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论价值阐释

# On the Methodological Valu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张 杰 (Zhang Jie)    许诗焱 (Xu Shiyan)

**内容摘要：**文学伦理学批评自提出以来，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依据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观点和陈述，来探究其合理性或存在问题。然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理论或批评自身，更在于其批评理论构建的方法论价值。从方法论的维度分析，不少关于该理论的争议也许就不存在了，至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初衷。本文将主要以聂珍钊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为依据，从问题提出的基础出发，围绕文学文本功能的客观性、脑文本、艺术形式的伦理性和包容性等方面展开探讨，努力挖掘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的缘由，揭示这一批评理论的方法论价值和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方法论；脑文本

**作者简介：**张杰，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阶段从事符号学、比较文学、俄罗斯文学与文论等方面研究；许诗焱（通讯作者），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阶段从事文学翻译及其理论、美国戏剧等方面研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ZDB0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the Methodological Valu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most scholars have employed its ideas and arguments to explore its rationality or problems. However, the valu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only in the theory or criticism itself, but also in the methodological value of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alyz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many of the controversies on the theory may not exist and at least the initial inten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an be deeper understood. Based on Prof. Nie Zhenzhao's article published o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the present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basis of presenting the question, and studies the objectivity of the function of the literary text, brain texts, and the ethics and inclusiveness of the form. It aims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present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o reveal its methodological value and some problems to be thought about, so as to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 to the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methodology; brain texts

**Authors:** **Zhang Jie**, PhD, is Professor and a doctoral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emiotic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z-jie1016@hotmail.com). **Xu Shiyan**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is Professor and a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heor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helenhelen99@163.com).

文学伦理学批评自提出以来，引起了文学批评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和持续争论。围绕着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伦理教诲，还是审美欣赏，争论双方各执己见。其实，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方法的提出，能够激起不同意见和看法，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好体现。最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又刊登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聂珍钊教授的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这就是对这一批评理论的最好评价。就目前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讨论而言，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从这一理论的具体阐释出发，也就是依据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观点和陈述，来探究其合理性或存在问题。这种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剖析，从理解这一理论的思想来看，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是言之有据的。然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理论或批评自身，更在于其批评理论构建的方法论价值。也就是说，从该批评理论及方法的提出来探讨，深入思考聂珍钊教授为什么会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从方法论的维度分析，不少关于该理论的争议也许就不存在了，至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聂珍钊教授的初衷。从问题提出的基础出发，发掘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产生的根源，显然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探索。本文将主要就聂珍钊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下面简称聂文）为依据，努力挖掘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的缘由，揭示这一批评理论的方法论价值，为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一、审美的主观性：功能的客观性与本体性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形形色色的外国文艺理论蜂拥而入。这一方面丰富了我国文学研究的批评方法和理论建设，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自身批评话语的缺失，甚至对文学文本这一研究对象客体性的相对轻视。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因此更注重用某种西方的批评理

论和方法来阐释文学现象，而且往往越是时髦的理论，就越受到文学批评界的青睐。正如聂文指出：“在文学批评领域，西方理论通过译介迅速进入中国，激活了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但西方理论在促进中国学术繁荣的同时，也逐渐占领了中国的部分学术阵地，不仅影响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潮流，各种新潮术语也嵌入了中国的学术话语当中。这种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新西学东渐，推动了西学在文学批评领域迅速传播并获得不少中国学者认同，但不可否认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话语的缺失”（聂珍钊 72）。针对这一现象，聂珍钊教授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在探索实现一种能够“体现中国学者提出原创性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努力”（聂珍钊 71）。

显然，聂珍钊教授的理论构建是极有价值的，虽然任何一种理论建构都不可能是完备的、无可挑剔的，但探索的最重要价值或许并非在于结果，而是存在于过程之中。因为几乎没有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是学界一致赞同而不存在非议的，再好的理论也都是在批评中不断发展的，或许这就是理论常青的缘故。理论探索本身的价值肯定要超出任何归纳的结论，结论永远只是新问题提出的起点，终点或曰学术海洋的彼岸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因此，如同文学阅读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寓教于乐的过程，理论探索的意义就是永远在路上，是一代代人的接力相传。

理论探索的价值在于执著的过程，这并非等于可以忽略理论主张的意义。文学的价值往往会超越文学自身，理论的意义也更是如此。在当今国门敞开、经济大潮猛烈冲击的商品社会，在崇尚个性发展、注重个体自身价值的现实社会，探索超越个体的精神价值，即弘扬正确的伦理道德观，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也许是《中国社会科学》刊登聂文的重要缘由之一。相较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批评或以某一种阅读方式为维度的文学批评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正确的价值观不仅可以引领读者阅读正能量的增长，稳定健康的现实社会发展，而且可以从伦理的维度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聂文的第一部分就以“伦理选择”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文学伦理学批评从思潮变为理论和方法，并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中得到有效运用”（聂珍钊 73）。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其提出的主要目的之一，还在于努力改变目前文学批评界的现状，即重理论阐释而相对忽视文学文本的细读。由于受到 20 世纪以来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文学批评界，尤其是外国文学评论界，似乎运用某一种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模式来解读文学文本，已经成为不少文学评论文章惯用的模式和追求的时髦，似乎批评的新意就来自批评视角和方法。聂珍钊教授坚持文学批评必须从文本出发，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以文学文本为批评对象”（聂珍钊 78），尽可能排斥把文本以外的因素纳入批评的视野。他把文学审美排除在文学的功能之外，就是因为这其中包含了读者的介入，产生了非客观文本的主观因素。聂教授

强调：“功能是文学作品固有的效能或作用”。“审美不是文学的功能，只是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的方法，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聂珍钊 86）。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这种批评立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注重文本分析也成了该批评的主要特征之一。

## 二、主体的对象化：意义的生命性与脑文本

文学文本是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显然并非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专利，几乎以文学本体分析为己任的批评都关注文本本身，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张杰等 263-305）。然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本的理解又是迥异于形式主义批评的，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学文本观。聂文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独特的文本观，这种文本观既不同于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文本观，也迥异于西方文本理论。“它按照载体分类，把文本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以大脑为载体的脑文本、以书写材料为载体的书写文本和以电子介质为载体的电子文本（电子文本也称为数字文本）。同时，基于三大文本类型的划分，文学伦理学批评以脑文本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文本理论”（聂珍钊 79）。

显然，“脑文本”的确是文学文本的基础。根据文学文本产生的先后秩序来看，文学文本产生于作家的脑，也储存于人的脑，在文字没有形成之前，它以口头文学的方式传播。在出现了文字之后，脑文本才有可能转化为书写文本，到了数字化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又以电子文本的方式传播。从方法论的维度来看，聂教授实际上是在把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对象化于文学文本。也就是说，任何文学文本均是由作家创作的脑文本转化而来的。这样一来，文学文本就具有了生命性特征，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意义存在体。同时，聂教授并没有忽视这一创作的脑文本与读者大脑接受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是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两个脑文本的内在联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伦理学批评超越了形式主义批评，既聚焦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又摆脱了唯文本分析的羁绊。聂教授揭示了从文学文本的产生（作家脑文本）、到文本的表述（书写文本）、文本的科技传播（电子文本），再到文本的接受（读者脑文本），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构建了由作家、文本、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文本意义共同体。

实际上，这种“三位一体”的系统化研究的基础就是研究主体的对象化过程。作家创作的最初形式自然是形成于大脑，一切文学文本都是脑文本的物理化过程，或是成为声音为载体的口头文本，或是由文字表述而成的书写文本，或是转化成数字媒介的电子文本。显然，在作家的脑文本中，创作的伦理道德取向是非常关键的，文学的教诲功能也源自脑文本，这也就成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的重要问题。

聂文是从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中来表明伦理选择是文明发展的必然产

物。他明确指出：“伦理选择过程是自然选择完成之后人类道德文明的新阶段，是人必须经历的通过具体的自我伦理选择活动获取人的道德本质的过程。通过伦理选择，人才能走出蒙昧，脱离野蛮。伦理选择不是所有物种的选择而只是人类的选择。自然选择是形式的选择，人长成什么模样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伦理选择是本质的选择、做人的选择”（聂珍钊 75）。聂教授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回眸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从已经发生的社会变迁来看，人类确实经历了由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的过程。不过，人类社会再由伦理选择往何处发展时，确实难以预测，毕竟历史发展的轨迹是无法判断的。任何规律性都是后人对已发生史实的归纳总结，是后人认知的结果。

聂教授根据当今社会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趋势，判断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之后，应该会进入一个由机器人为主导的科技选择阶段。在进入那一阶段后，人类社会的伦理问题也就随之消亡了。对于这一观点，目前确实难以证明。不过，从人类社会已经历的过程来看，人类进入伦理选择阶段时，是在产生了私有制和出现了家庭之后。可以想象，人类如果要走出伦理选择阶段，就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自然也不将存在家庭这个社会的最小细胞。因此，可能出现的就是一个超越伦理道德的阶段，即超伦理选择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一定会极大地影响未来人类社会，但是人类社会还是能够掌控机器人的，因为任何智能化的产物毕竟是人创造的，人也一定不会让他失控的。

因此，文学创作的脑文本就应该不只是弘扬当下的伦理道德观，更不是宣扬固定不变的伦理道德思想，而是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反映共同人性或曰人道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指向未来的社会伦理精神。文学的脑文本其实也应该是指文学文本自身的意义再生机制，即把文本视为一个大脑机制（张杰 康澄 57-78）。

### 三、意义的形式因：形式的伦理性与包容性

文学伦理学批评坚持文学创作要弘扬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倡导文学的教诲功能，这显然是与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然而，文学伦理学批评所要揭示的文学教诲功能，又不仅仅存在于文学文本的思想内容之中，而且更体现于文学文本的艺术表达方式。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所反映的正能量、积极的伦理观，是具有审美艺术感染力的。文学艺术的形式本身就可以创造内容，反映伦理道德思想，因为文学创作的意义也蕴含在形式之中。每个文学作品的形式都具有自身的形式因，即形式的意义。

杨国静教授在《客体化、反象征和面向他者的真诚：客体派诗学的后现代伦理面相》一文中，就结合具体的诗歌创作，深刻指出了以象征诗学为代表的西方诗学传统及其深层的伦理危机，并探讨了客体派诗歌创作的伦理原

则，即借助创新的客体化形式深挖语言的物质性并遏制移情机制和修辞话语，以达到尊重他者异质性的真诚表达（杨国静 68-87）。显然，文学创作形式的伦理意义并非只是在于直接转达作者的主观意识，更不是在于作者强加给读者的伦理道德思想，而是蕴含在对读者尊重的形式之中。

文学创作虽然来自现实生活，可又是超越社会现实的。这也是文学伦理与社会伦理的迥异之所在，前者并非只是在表达形式上与后者不同，在具体的伦理思想上也是不一致的。文学创作往往走在时代前面，引领社会的发展，并且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在读者和现实生活之间“间离”出一定的距离，产生“陌生化”效果。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能够让读者从旁观者的视角来审视，摆脱实际的利害关系，站在社会发展的更高层次，来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张杰 许诗焱 52-61）。

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创作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初衷肯定是要表现一个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不守贞洁的女人。然而，托尔斯泰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在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过程中，主人公安娜渐渐被塑造成为了一个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的、追求新生活的女性。托尔斯泰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读者与现实拉开距离，站在超越现实的层面，感受着新女性形象安娜的艺术魅力。

任何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类社会就经历过从群居的“自然选择”阶段到后来的“伦理选择”时代。即便是在“伦理选择”时期，伦理道德观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在以往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观，也许今天就是不再被认可的。例如，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自由恋爱被视为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而就在那个时代，出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文学故事。这一作品无疑是提倡了为当今社会所接受的伦理道德观。以往违背伦理道德的现象，成为了文学创作歌颂的对象。

其实，文学创作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开放体系，文学的教诲功能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即现实与真实的层面。前者是通过文学创作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弘扬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服务于社会；后者则是以独特的艺术形式，给予读者以超越现实羁绊的可解读空间，赋予读者阅读和想象的自由，以此来实现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在文学创作中，现实是指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而真实则是包含着主客观融合的、对现实超越的真理求索。文学伦理学批评既要指向社会现实生活，揭示文学创作与当下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更要面向真实世界，指向人类社会可能的未来，即发展着的伦理价值观。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批评理论及方法，它既不拘泥于社会历史批评，也超越了惟艺术形式的审美批评，更不会在读者的解构批评中消亡。这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批评理论及方法，尽管它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和不断丰富。我们可以肯定地

说，聂珍钊教授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世界文坛上，发出了中国声音，为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做出了值得借鉴的贡献。

### Works Cited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Nie Zhenzhao.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205-206.]

张杰等：《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Zhang Jie et al. *The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Beijing: Peking UP, 2017.]

张杰、康澄：《结构文艺符号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Zhang Jie, Kang Cheng. *Constructive Art Semio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杨国静：“客体化、反象征和面向他者的真诚：客体派诗学的后现代伦理面相”，《外国文学评论》4（2017）：68-87。

[Yang Guojing. “Objectification, Anti-symbolism and Sincerity to the Other: Post-modern Ethics of Objectivist Poetr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2017）：68-87.]

张杰、许诗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审美价值论阐释”，《文学跨学科研究》3（2020）：52-61。

[Zhang Jie, Xu Shiyan. “On the Aesthetic Valu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0): 52-61.]